读史
札记

济尔哈朗与宁远之战

李 新 达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死。因他生前“储嗣未定”①，所以，在统治集团内部，就皇位继承人问题，经过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后，终于达成一项折衷协议，即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爱觉新罗·福临为帝。由于福临年幼无知，“诸王、贝勒公议，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②。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作为摄政王来说，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本来是平等的，并且由于年长和当时的特殊情况，济尔哈朗的名字还被公认理当排在多尔衮之前。可是，数月之后，即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济尔哈朗突然以他个人的名誉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③很显然，济尔哈朗如此甘居于多尔衮之下，绝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被迫。

那么，迫使济尔哈朗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宁远之战的失败，是直接导致这次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许多重要的史书里，关于宁远之战的记载，虽然非常简略，互相矛盾，但都一致认为仍然是以胜利而告终。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们对宁远之战的全过程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再证之以朝鲜方面的有关记载，人们自然就会对宁远之战的结果及其对济尔哈朗的影响，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宁远未破，被迫撤兵、前功尽弃

明清松锦大战之后，经过补充整顿明军以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军队为主力，依然固守在山海关外的宁远、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城，迫使清兵不敢逼近山海关。皇太极曾利用松锦决战胜利的声威，千方百计地诱降关外明军，但始终未能成功。崇德八年九月，济尔哈朗“统领大军，载红衣炮及诸火器，征明宁远”。目的就是要实现皇太极生前既定的战略方针，用武力来扫清通往山海关前的道路，为入关夺取中原地区作必要的准备。宁远城的防御工事

清代黑龙江档案编选工作开始进行

为了便于黑龙江地区史、志的编写，为了更有利于清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商定，从1984年起，至1994年止，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全部历史档案，进行一次总检阅，并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每年精选出五十万字，交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月二十日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两名同志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名同志，已经全力以赴地开展了编选工作。（贾进）

最为坚固，素称“关外重镇”④，清军来攻必首当其冲。蒋良骐《东华录》和《清史稿·阿济格传》都说清军首先攻下了宁远城。而《清史列传》、《清实录》、《清 史 稿·世 祖本纪》、《清史稿·济尔哈朗传》等,只说清军攻宁远,至于攻下还是没攻下，则略而不详， 有意回避。可是，《沈馆录》却明确记载说，清军虽然攻下了中后所、前屯卫，又占领了明军事先放弃的中前所，但由于“孤单深入，前山海关势难卒易进犯，后有宁远、沙河（后）两镇，下无见阻之弊，姑为退休兵力，更图进取之计”⑤。这就是说，清军由于没有攻下宁远城，退路受到明军威胁，而临着前有山海关，后有宁远城，屯兵坚城，援绝粮尽，全军被歼的危险，所以不得不立即撤兵。清兵撤退后，关外三城又被明军收复，清军反而被迫加强锦州防御。直到顺治元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内逼，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尽弃关外四城，召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统边兵入关卫京师”⑥，清军才又乘虚而入，进逼山海关。

二、伤亡惨重　俘获不多　士气低落

据《清世祖实录》卷二载，清军占领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时，共俘获人口七、八千，牲畜、财物、武器等无数，可谓大胜而归。按照清军惯例，既然战果如此辉煌，理当官兵共享。奇怪的是这次却不同以往，所有俘获，只分给“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及八旗官员”⑦，广大士兵则一无所获。分官不分兵，按照惯例，正好说明所获不多。当时，朝鲜世子李溰正在沈阳，他说济尔哈朗出师不久，就从前线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称清军战无不胜，已俘获“男女万余口，牛、马、驴、骡并七千余头”。可是，当清军返回沈阳时，只见他们“或四五、或六七、或八九，各自作伴而归，而人马饥疲，俏俏无兴，亦无人畜财货输运之物”。分明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哪里象凯旋归来的军容。亲见此情此景，不仅李溰感到与先前清军从前线传来的“夸张之说大不相同”，而且沈阳城里的官民也“无不喧传”。有人自锦州回沈阳时，“与此军终始同行，且见其实状”就是如此。李溰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象，就派翻译官朴申继暗地里“探问其曲折”。原来“中后所、前屯卫两城将陷之际，城中公私家舍一齐放火，勿论男女各自烧死，资粮机械亦皆烧尽，分叱不喻。沙河（后）卫段收入宁远，中前所段收入山海关，举皆守城清野之故，欲进欲留军无见粮，且孔、耿二将以前锋伤损其兵有倍于清人，以此速还，以为休养进取之计”⑧。

三、被迫居后，自我辩护，东山再起

固山额真杨古利、贝勒阿济格、多铎等曾一再向皇太极奏言：“敌者杀之，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户口，所俘各照牛录上献。至于兵士所获，不计多寡，听其自取。若此则人人贪得，不待驱逼,而贾勇争先,兵势大振。”“先我兵围大凌河四阅月，尽获其良将精兵，在皇上与诸贝勒大臣固有得人之庆，但部下士卒及新附蒙古等，一无所获，皆以为徒劳。”“我国之兵非却于斗者，但使所得各饱其欲，则虽死不恤。稍不如意，遂无斗志……臣愚以为，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⑨可见因战争的掠夺性所决定，作为摄政王，无论是济尔哈朗还是多尔衮，要想巩固和提高他们刚刚获得的最高地位和权力，就必须通过战争的胜利来鼓舞士气，争取人心。宁远之战先给济尔哈朗提供了良机，然而他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多尔衮则充分地利用这次失败来压低济尔哈朗,抬高自己,孤立对手，争取人心。例如，济尔哈朗率军出征宁远时，多尔衮亲自率领“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以上，俱诣堂子，吹螺掌号，行三跪九

叩头礼，树八纛，复向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鸣炮三，大军西发”⑩。而当济尔哈朗“统兵自宁远还”时，只“命多罗绕余贝勒阿巴泰率文武各官出迎”⑪，礼仪十分简单。多尔衮显然有意当众贬低济尔哈朗，用对待败军之将的冷淡态度来孤立他。与此同时，当济尔哈朗被迫当众宣布退居多尔衮之下后，多尔衮便立即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誓告天地，期同矢忠报国”⑫。接着又“增和硕亲王仪仗”⑬，“叙征锦州、松山、山东、兼克中后所、前屯卫、黑龙江功”⑭，借以巩固从济尔哈朗那里争来的胜利，进一步收买人心。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在多尔衮的怂恿下，贝子吞齐等人“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罪”。主要告他“久无为国宣劳之处，及定大业，又无辅佐之功”⑮。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东山再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多尔衮尸骨未寒，济尔哈朗等人便急不可耐地“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说他“独擅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⑯。又将“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⑰等。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又有意为当年的宁远之战辩护，说他是“凯旋”而归，有辅佐之功。还有意贬低多尔衮，说当时公议济尔哈朗留守盛京，“佐理皇上机务，而遣睿王出师，往取燕京。彼时燕京不过一空城耳，有何伟绩哉……夫燕京一城，即他王攻取，亦势在必克”⑱。这场论战说明，宁远之战对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之间的关系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宁远之战失败的真象及其影响，才被清朝统治者有意无意地隐埋起来，现在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侯了。

历史现象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想当年，号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惨败在宁远城下，“大怀忿恨而回”⑲，不久即病死。曾几何时，东征西讨，战功赫赫的济尔哈朗又步其后尘，败在宁远城下，使他从权力的顶峰上逐渐滚落下来。而顺治元年正月发生的事变，就是他滚落下来的起点。

---

①《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崇得八年八月庚午 。

②《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八月乙亥。

③《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正月己亥。

④《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壬寅。《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

⑤《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本。

⑥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

⑦《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十月辛已。

⑧同⑤

⑨《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六月。

⑩《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九月壬寅。

⑪《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十月丁丑。

⑫《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正月甲辰。

⑬《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正月乙已。

⑭《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二月丁卯。

⑮《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顺治五年三月已亥。

⑯蒋良骐《东华录》卷六，顺治九年二月已亥。

⑰《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顺治八年二月已亥。

⑱《清世祖实录》卷九十，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

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